
特朗普的支持者在想什麼？激進群眾運動的心理學

余創豪 chonghoyu@gmail.com



萬馬齊瘖究可哀？

特朗普現象似乎令人費解，為什麼在具有深厚民主傳統的美國，會兩度選出一個性格乖僻、口沒遮攔、學識淺薄的狂人入主白宮呢？這當然可以用很多政治、經濟理由去解釋，例如人民厭倦了左派的政策、擔心通貨膨脹。然而，在整個共和黨裏面是否沒有其他人才可以解救美國的政治和經濟問題呢？為什麼特朗普在共和黨初選辯論時完全缺席，卻仍然可以輕而易舉地擊敗所有共和黨候選人呢？一個三億多人口的大國，難道真的沒有人才嗎？難道真的已經落到「萬馬齊瘖究可哀」的地步嗎？更加令人瞠目結舌的是：特朗普好像是神靈一般，支持者認為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對的，美利堅大地飄揚的彷彿是一片紅旗，而不是星條旗。

要理解民眾對特朗普死心塌地的支持，需要超越政治、經濟分析，深入到塑造人類行為的心理和社會層面。針對這問題，有兩位思想家曾經提出具有高度參考價值的理論，他們就是埃里克·霍弗（Eric Hoffer）和埃里希·弗洛姆（Erich Fromm）。霍弗是一位自學成才的美國哲學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和極權主義政權崛起的背景下，他於1951年出版了《真正的信徒》一書。弗洛姆是德國心理分析學家和社會理論家，他在納粹黨崛起時投奔美國，1941年寫下了《逃避自由》一書。儘管寫作背景截然不同，兩人都深切關注為什麼人們願意追隨獨裁者和參加激進運動，他們的見解至今仍是歷久常新。

追隨者被賦予特殊的身份

《真正的信徒》講述群眾運動的心理及狂熱追隨者的特徵。根據霍弗的說法，群眾運動吸引了感到沮喪和不滿的人。負責任的政治家不會隨便開空頭支票，謙卑的領袖不會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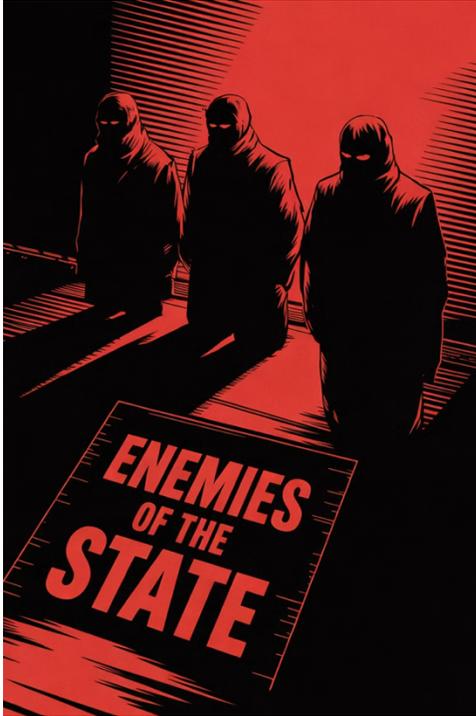
自己什麼都懂，理性的學者不會妄斷，但對那些群眾來說，這類人沒有吸引力。相反，語不驚人死不休的狂徒以救世主的姿態橫空出世，他承諾自己不僅能提供解決方案，而且可以徹底顛覆千瘡百孔的現存體制，從而改善人民的生活和帶來美好的明天。在霍弗看來，這類運動提供了一種在解決問題的同時又可以逃避個人責任的方法，他賦予追隨者一個特殊而且重要的身份，他們再不是滄海一粟、無名小卒，他們是一場偉大運動的一份子。在急病亂投醫的情況下，特朗普難以抵擋的魅力就變得更容易理解了。他的政治言論充斥著不滿、失落和怨恨的主題，對於那些因為全球化、技術變革或社會價值觀變遷而感到被遺棄的人來說，特朗普運動就像霍弗所描述的群眾運動一樣，為追隨者提供了一種超越個人的目標感和認同感。



誘過於人民公敵

霍弗強調，這類運動的具體內容不是最重要，更加重要的是，它提供了一個令人信服的敘事和一些明確界定的敵人。特朗普主義沒有深厚的理論基礎或者一套連貫的政策目標，特朗普運動的蓬勃發展，是源自於一種引起共鳴的故事：美國正在衰落，當權者腐敗，左膠橫行，只有特朗普才能讓國家恢復昔日的偉大。這種論敘述找出了一些代罪羔羊，例如移民、知識分子、媒體、政府冗員、民主黨、深層政府、與美國進行貿易的外國……等等，當矛頭指向這些國家的「敵人」時，便會「大快人心」。霍弗指出，群眾運動必須培育仇恨作為一種團結形式，而特朗普的政治風格巧妙地運用了這一策略，將其基本盤的恐懼和焦慮引導為對「他者」的抗爭。

舉例說，美國貿易和製造業高級顧問彼得·納瓦羅（Peter Navarro）在接受福克斯新聞台採訪時為特朗普的高關稅政策辯護，他表示，美國不能擁有製造業，因為在過去幾十年，全世界都在「剝削」（Rip off）美國。真的嗎？貴為全球第一強國的美利堅，在過去幾十年都被全世界欺負嗎？到底這是否屬實並不打緊，人們無需要深究為什麼台積電的半導體技術比英代爾優勝，民眾只需要認為責任不在我方，只需要遷怒他人，便可以放下心頭大石。此外，馬斯克將美國國際開發署描述為「犯罪組織」，本來削減支出是很正常的



事，但這種言論已經超越了一般機構裁員的常態，這是要將人妖魔化，要將他們定性為「人民公敵」。

合理化非法和反智

此外，霍弗解釋說，參與這類運動的人往往將自己的融入集體中，失去自我並不被視為一種犧牲，而是從不安全感和個人責任中被解放出來，這種運動的動力是來自領導者與追隨者之間的情感紐帶以及對救贖使命的共同信念。在這前提下，任何荒謬的東西都會被偉大領袖和偉大使命合理化。特朗普不斷地重申，為了一個遠大的理想，任何手段都是合法的，今年2月，他在Truth Social上發文：「拯救國家的人不會違反任何法律。」無獨有偶，1977年前總統尼克遜在接受英國記者戴維·弗羅斯特（David Frost）採訪時說：

「總統做的便不算違法。」這是獨裁者共同的信念，但不同的是，尼克遜因水門事件而被趕下台，幸好當時美國沒有鑄成大錯。

霍弗指出：在這種群眾運動中，理性思維被強烈的情緒取代，追隨者並不會細心分析事件中矛盾和複雜的地方。以現在的情況為例，一方面，特朗普總統簽署行政命令去解散教育部，主張將教育監督權下放給州和地方政府。然而，與此同時，特朗普威脅向不符合其政策目標的大學停止提供資金，例如哥倫比亞大學因被指控容忍校園內的反猶太主義而面臨被取消四億美元聯邦資助。主張減少聯邦監督，同時利用聯邦資金作為影響教育機構的槓桿，這凸顯了特朗普政策的矛盾。國立台灣大學政治系名譽教授明居正曾經一針見血地指出：如果將某個政黨在不同時空的主張放在一起，你很容易察覺到許多東西前後矛盾，但仍然有人相信。這是非理性群眾運動的共通點。

然而，這種反智的態度對沒有受過高深教育或者不喜歡邏輯思維的人來說，正正是一種解放的福音。他們可以在偉大領袖的蔭底下，不需要通過艱苦的學習和研究過程，便推翻了建制和學術「霸權」，從而發掘出另類「真相」。我不禁想起法國思想家伏爾泰的名言：「那些能夠令你相信荒謬東西的人，會使你犯下暴行。」

人民缺乏安全感和歸屬感

弗洛姆的《逃避自由》與霍弗的見解相得益彰，該書深入探討了現代自由的悖論。弗洛姆認為，現代化雖然將個人從傳統的社會結構中解放出來，但也產生了孤立感、無力感

和生存焦慮。在前現代世界，人們在家庭、宗教和社區中扮演著固定的角色，例如子承父業、安土重遷。資本主義和世俗化加速了傳統結構的崩壞，導致許多人失去了身份認同和人生目的。人們渴望安全感和歸屬感，而威權運動恰好可以滿足這種渴望。美國在過去幾十年出現了劇烈的社會變遷，美國的少數民族人數快速增加，白人感受到自己的生活方式受到威脅；全球一體化令傳統工業式微，難以跟隨時代步伐的人再不容易獲得高薪厚職；左派思想籠罩社會，傳統價值觀受到挑戰……，這一切都是獨裁者崛起的溫床。

民主退潮下的威權主義

弗洛姆指出了人們擺脫自由負擔的三種主要機制：威權主義、破壞性和自願一致性。這三點都可以在特朗普支持者的心理中觀察到，許多特朗普追隨者不僅將他視為一位政治領袖，也視他為一位能夠在混亂的世界中建立秩序的強人。這是逃避自由的深層心理需求，弗洛姆將此描述為一種施虐和受虐的動態，獨裁者透過支配他人而覺得自己充滿力量，跟隨者則完全服從強人而重新得力和感到安全。一些特朗普的支持者對筆者說，民主體制缺乏效率，人們喋喋不休地爭論，結果一事無成，只有特朗普這種強人才可以成就大事。他雖然口出狂言，但他是對的；現在他看似毫無章法，其實他是在下一盤大棋。



人性堤壩炸開後的破壞性

第二種心理機制是破壞性，其實很多人都曾經幻想過毆打甚至殺死自己憎恨的人，但社會規範和法律壓制這種行為。無奈，魅力領袖卻可以令人們將焦慮和挫折轉化為攻擊性行為。特朗普的語言暴力，正是以政治改革的名義去炸開阻攔着醜惡人性的堤壩，釋放出人們破壞性的衝動，於是乎，特朗普支持者以「整人」為樂，而不會感到羞恥。例如管理和預算辦公室主任羅素·沃特（Russell Vought）曾經洋洋得意地描述自己怎樣去折磨聯邦僱員，他說：「我們希望官員受到精神創傷，當他們早上醒來時，我們希望他們因為越來越被視為惡棍而不想去上班。」。

回音室造成自動一致性

自動一致性是第三種機制，在傳播媒介發達和消費主義的社會中，許多人沒有經過批判性思考就接受了一些價值觀。特朗普主義提供了一種簡單的世界觀，人們無需仔細咀嚼就能吸收。現在，社交媒體透過回音室（echo chamber）來強化群體思維和過濾了不同的意見，從而強化了自動一致性的現象。在多元世界中，人們感到迷失，覺得自己是隱形或無關緊要的。但進入了特朗普的世界，便可以不需要理會世事的複雜性，不需要考慮其他觀點，不會發生認知失調（cognitive dissonance），這是所有問題都必有答案的人間淨土。

弗洛姆強調，真正的自由不僅僅是沒有約束，而是在與他人的互動中建立自己的想法。這種自由需要情緒成熟、自我反省、以及自發性的創造力。不幸的是，在一個經濟不穩定、社會價值觀混亂、教育不如理想和政治兩極化的社會中，這種特質很難培養出來。在這種情況下，當一位強人承諾給予簡單答案並且回歸黃金時代，人們便很難抵擋這種誘惑。

結語

霍弗和弗洛姆都認為，群眾運動的成功並不一定在乎專制領袖的能耐，而是追隨者的心理需求能否得到滿足。我並不否認部分特朗普的支持者是出於理性考量。然而，即使現在面對着經濟、內政，外交種種崩壞，儘管特朗普的所作所為與基督教價值觀和共和黨的一貫主張背道而馳，他的支持者仍然忠貞不渝，這表明其中還有更深層的原因。這種忠誠的核心不是基於一套信念或者意識形態，而是一種心理契約。美國何去何從？到底是夜盡露曙光，還是低處未算低？我無從得知。

2025年4月8日

原載於澳洲《同路人》雜誌

[更多資訊](#)